

汉语圣经和合本的翻译策略

——兼论和合本的废与存

陕西师范大学 马乐梅

提 要:一百年前翻译的和合本是目前通行的圣经汉译本,也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圣经汉译本。和合本的成功在于其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为载体,采用了倾向于源语的“字句切合”的翻译策略。本文分析和合本的白话文质量和“字句切合”的程度,并指出和合本的难懂主要在于其基督教思想的独特性;汉语语体的变化使圣经再译成为必然,但和合本将因其鲜明特点而长期存在。

一、有关和合本

和合本是当前华人教会(新教)的通行圣经译本,也是汉语文学界和学术界最普遍采用的圣经版本,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圣经汉语译本。

在19世纪,我国国内先后出版了30多个版本的圣经译本或译本片断(赵维本,1993:32)。为了促进传教的合一,1890年在圣经公会主导下,欧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进行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和合本”即指新教各个教派普遍接受的、适应不同文化阶层的统一的新旧约汉语译本(Strandenaes, 1987: 79)。大会决定选用1885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圣经》(English Revised Version)作为和合本的蓝本。(据Strandenaes的研究,和合本主要采用了修订本的行文,在为数不多的不同于修订本的地

方,多以括号注释的方式给出其他权威行文。)大会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深文理和合译本》、《浅文理和合译本》和《官话和合译本》三个译本的翻译(由于文体变化,前两个译本行世不久)。现在所说的和合本指《官话和合译本》。负责这个译本的委员会于1891年11月初次集会,1919年1月新旧约全书完成面世,前后费时长达27年之久。

和合本主要翻译者为欧美在华新教传教士。官话和合本的译者主要为 Goodrich, Owen, Baller, Lewis 和 Mateer (the English Preface 2 of the Union Mandarin Version NT) (转引自诚质怡,1965:19),也有华人参与译本的修改及润色。现保存在美国圣经公会的一帧《官话和合本》修订委员会(成立于1913年)的照片上有四位华人,可惜姓名难以稽考,只知他们的姓氏分别为李、袁、刘和王

刘承宇,2002,英汉语篇互文性对比研究,《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

陆谷孙,1998,词典的继承和创新,《辞书研究》第1期。

吕叔湘,2002,《中诗英译比录》,北京:中华书局。

孟伟根,1993,评《现代汉英词典》的成语英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

危东亚,1995,《汉英词典》(修订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吴光华,1999,《汉英大辞典》(第1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吴景荣,1978,《汉英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景荣、程镇球,2001,《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许明观,“羽扇纶巾”一周郎, <http://www.dhgizx.com/tweb/xmg/1-151.html>(2002-9-5)。

许渊冲,2003,新世纪的新译论,《中国翻译》第3期。

伊宁,“红袖”如何“添香”, http://www.rayli.com.cn/2005-07-06/L0011002_129772_1.html (2005-7-6)。

(通讯地址:200062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中文圣经启导本》,1996:1884)。《官话和合译本》几经修改,后改称《国语和合译本》(1939年)。和合本自出版之后,“在中国各地教会之中西信徒,均以其与西文吻合为妥,争相购读,称羨不已”(柯向荣、张崇德,1916:106;转引自赵维本,1993:43)。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和合本基本上取代了所有其他译本,成为华人教会、文学界、学术界最广泛使用的中文圣经,其主导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二、和合本的翻译策略

1891年11月21日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上制订了官话和合本的译经策略(转引自诚质怡,1965:19)。

下面笔者将依次简单地分析这五项原则。

第一项“译文须为白话,为凡识字的人所能了解者”。这一原则直接地确定了译文的语域——“白话”。当初教会中的守旧人士,以及轻视白话文的人士认为“经必须有经的文体”,白话文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更无从释经载道。但白话文浅显易懂,句式灵活,极大地摆脱了文言文中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下面一段约翰福音3:16-18的译文足以说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优劣。

深文理和合本(文言文)

盖神爱世,至赐其独生子,俾凡信之者免沦亡而有永生。因神遣子入世,非以鞠世,乃令由之获救,信之者不受鞠,不信者已鞠矣,以其未信神独生子之名也,是鞠也。

官话和合本(白话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官话和合本最大的成功就在于白话文。百年之后的今天,所有文言文圣经都已进入历史,唯有以白话文作为载体的官话和合本得以存留。

但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开始于白话文运动之前。当时,白话文尚未定型,译文在使用白

话文方面仍不够彻底,在个别地方有“半文不白”的现象(顾敦铤,1965:120)。例如:

…… 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
(马太福音3:10)

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箴言28:21)

没何谋攻击耶和华呢?(那鸿书1:9)

其次,受到文言文影响,和合本中的白话文有些地方缺少必要的语气词和助词,使语气不自然,节奏混乱,从而影响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刘翼凌,1965:101-103)。请看以下几例:

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
(创世纪50:17)——句末应该加一个“吧”字。

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约伯记7:17)——在“人算什么”之后应加上“呢”。

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马太福音13:13)——原意为“他们看了,却看不见,听了,却听不见”。

第二项“译文须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不可用地方的土语”。这项原则在和合本中得到很好的执行。从下面两个不同版本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和合本语言的全国通用性。

约翰福音3:3-6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可底母说:“人已经死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和合本)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人若然勿重新再养末,勿能见神国。尼哥底母对俚说,人已经老之,落里能再养,岂能再进娘胎养出来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人若勿从水圣灵养末,勿能进神国,从肉身养个末,是肉身,从圣灵养个末,是灵。(苏州方言译本)

不过由于和合本的翻译人员主要在中国北方传教,他们的语言受到北方方言的影响,译文中个别地方使用了一些北方方言的特有

词汇,例如:

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 2:4)——其中“验中”为山东方言。意为“许可”。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列王纪下 4:39)——其中“掐菜”一词为北方方言。

第三项“译文必须简单,在礼拜堂诵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了”。这项强调的是译文的容易性以及可听性。就此项原则而言,白话文是最好的策略,前面也已进行一些分析,这里不再赘言。

第四项“译文的字句必须忠于原文(与原文切合)”。这项原则最为重要,表明和合本的翻译是形式对等的翻译。下面我们以一些经文为例,探讨和合本在字词和句子两个层面所体现的翻译原则。

首先,在字词方面,从字词一致性(verbal consistency)上来看,和合本体现出明显的形式对等原则。请看修订本、和合本与按动态对等原则翻译的现代汉语译本比较:

1) 马太福音 24:22

修订本 no flesh would have been saved.

和合本 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现代版 没有人能够存活。

2) 哥林多后书 10:2

修订本 walk according to the flesh.

和合本 凭着血气行事

现代版 凭着属世的动机行事

3) 加拉太书 4:23

修订本 born after the flesh

和合本 按血气生的

现代版 循着自然生的

很明显,这里和合本采用了字词一致的原则。在以上几例中,“血气”一词有时用得很不自然,如例 3;有时具有误导性,如例 1。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和合本“血气”一词随着它的重复,逐渐将自己的独特含义清楚地表露出来,例 2 中“血气”的翻译要比现代版中的相应翻译更为精确。

但是,和合本并非完全受字词一致原则

的束缚。译者为使其更易懂,权衡之下有时不得不放弃他们所制定的字词切合的原则。请看以下几例:

4) 路加福音 24:29

修订本 a spirit hath no flesh and bones

和合本 魂无骨无肉

5) 罗马书 8:3

修订本 what the law could not do, in that it was weak through the flesh.

和合本 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由此可以看出和合本并不完全受字词一致原则的限制,圣经文本学者及英文新修订标准版(NRSV)译委主席 Bruce Metzger 将这种翻译策略称为“尽可能直译,必要时意译(as literal as possible, as free as necessary)”。

和合本在字词层面上与原文切合还表现在保持原有词性上,例如:

路加福音 1:48 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现代本: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

诗篇 106:7 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当代版:在红海旁反叛你。)

出埃及记 15:2 也成了我的拯救。(当代版:是拯救我的主。)

其次,在句子层面上,和合本与原文的切合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被动句的翻译上。犹太民族从来不用名字称呼他们的神,所以,圣经中许多句子当神是施动者(agent)时,采用被动句。而汉语更多使用主动句,且汉语也没有不能提神的名字的忌讳。因此,被动句的翻译在和合本中值得仔细研究。

现在我们以马太福音五章 3-10 节的八福词为例分析和合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

修订本: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are they that mourn, for they shall be comforted.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Blessed are they that hunger 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shall be filled.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shall obtain mercy.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shall see God.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sha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Blessed are they that have persecuted for righteousness' sake,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和合本: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在这一段中,修订本中每个主句都是被动句,施动者(agent)都是“神”,但为避讳的缘故,没有给出。而和合本中,所有主句都成了主动句。原来的过去分词改译为形容词,这更符合汉语习惯。但是没有译出原文中隐去的施动者,语义多少有些不清楚,若加上隐含的施动者,汉语译文会更加准确,如“神赐福虚心的人……。神赐福哀恸的人……。”除主句之外,还有三句从句也是被动语态,即 they shall be comforted, 他们必得安慰; they shall be filled, 他们必得饱足; they sha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三句仍以被动句的形式译出,但很巧妙,看似主动句。这里也没有译出原文中隐含的施动者“神”。以动态对等为指导原则的现代版就将其译为“神要安慰他们”;“神要充分地满足他们”,以及“神要称他们为儿子”。

在句子的长度方面,和合本也亦步亦趋,追随修订本。在比较了马太福音四章的译文和以弗所一章的译文后,读者可以明确感受到“(和合本)句子或长或短,主要决定于原文句子的长短。原文句子长,则译文句子长,并因此不自然;原文句子短,则译文句子流畅活

泼”(Strandenaes, 1987:92)。

第五项“比喻之处,应竭尽所能,直接译出,不可直译大意”。圣经中有大量的比喻,因此比喻的翻译质量直接影响着圣经信息(message)的传递。但是圣经的游牧文化与中华的农耕文化相去甚远,比喻所用的喻体(vehicle)也非中华文化所熟知之事物。因此,比喻的翻译一直是圣经汉译的一个难点。在和合本之前的圣经汉译中,一般倾向于取其大意的翻译方法。然而,意译很可能丧失作者的原意。因此,和合本的译者主张把比喻直接译出。直译和意译的效果如何,请看下面的比较:

诗篇 18:1-2

北京官话译本 主赐我力量,主庇佑我如高山,如保障,是解救我的。我天主如磐石为我所倚靠,遮庇我如盾牌,保护我得胜,护卫我如坚城。

和合本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華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

哥林多前书 13:1

现代本 纵然我能操世上一切的语言,又能说天使的话,但如果没有爱,我所讲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话,如同嘈杂的声音而已。

和合本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

通过比较,从以上几例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直译的和合本译文确实造成了一定的理解困难。这些译文有的要仔细思量,细心揣摩,才可以领会(如哥林多前书 13:1)。而有的则因为喻体在中华文化中没有相似的联想,若无其他参考书的帮助,只靠上下文推测,则只能对其略知一二,如诗篇 18:1-2 中的岩石、山寨、磐石、角、高台等。但在保存原文诗歌韵味方面,和合本显然技高一筹,它的译文更富有诗意。

这两种译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赵维本(1993:42)认为,直译的效果并不理想。但笔者认为,和合本的比喻直译除上面分析的

优点外,至少还有以下三点值得称道:1)体现圣经的历史感。早期游牧文化的喻体,如角、高台、山寨等,让读者对圣经文化更有直接的感触;2)更能保存和体现独特的圣经语言(biblical language);3)更能丰富汉语语言。直译的比喻能丰富译入语的语言,能使译文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源语的独特语言风格,这一点在翻译界已形成共识,和合本在这方面贡献很多,例如:

马太福音 10:6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行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诗篇 17:8 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瞳仁。

马太福音 19:24 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上述例子中,“迷失的羊”、“眼中瞳仁”,以及“骆驼穿针眼”都已进入了汉语,成为汉语中的新鲜血液,丰富着汉语的语言。

三、和合本翻译策略探源

和合本的五项翻译原则可大致分为通俗易懂原则(第一、二、三项)和字句切合原则(第四、五项)。

和合本译委会采取通俗易懂的翻译策略,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圣经原文的语域。虽然圣经原文太过久远,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圣经文本本身以及相关考古发现,得到有关圣经语域的线索。首先,圣经的一些经文本身提到圣经的语域,旧约哈巴谷书中神将启示赐给先知哈巴谷并命他将之公布于众时,写道:“将这默示明明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或作随跑随读)”^①(so that a runner may read it)^②(哈巴谷书 2:2)。新约哥林多前书中保罗在宣讲神的奥秘时,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lofty words or wisdom)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除此之外,考古发现也表明圣经的语域为通俗易懂,而非高雅深奥。1947年出土的死海古卷中圣经的措辞与同时出土的世俗作品相同。经文所用词汇、比喻都是当时民众非常熟悉的。德国学者阿多夫狄斯曼对圣经的纸草纸抄本(Papyri)的研究发现,新约是

用民间日常的语言所写成。这一发现给后来翻译新约的人士以极大鼓励,采用当代日常用语的圣经译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Halley, 1924:934-935)。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圣经就是用“市井语言”(street language)写成的(Marlowe, 2004)。和合本的译者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采用了通俗的白话文作为载体。

其二,圣经翻译的传统。在圣经翻译史上,成功的译本都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译成。在圣经翻译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武加大》拉丁文译本(武加大是 Vulgate 的音译,意为“通俗的”,此译本也被称为《通俗拉丁文译本》)和马丁·路德的德语译本就是极好的例子。

其三,传教的目的。圣经的翻译主要是为了宣教,译者的初衷是为了让受众明白神的旨意。正如尼希米八章八节所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当和合本将自己定位于“全国各阶层”都能明了的、各教派统一的译本时,通俗易懂也就成了它唯一的选择。

而和合本圣经采用倾向于形式对等的“字句切合”的翻译策略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其一,当时新教的传教策略。十九世纪的新教在华传播是一种强势国家向弱势国家的文化传播。在此过程中,传教者不再像其前辈一样(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采用温和的适应的方式(accommodation),而是采用了强硬的征服心态(吴义雄, 2000:158)。这种传教策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翻译策略,强调原文至高地位的字句切合翻译理论自然成为译者们的首选。

其二,基督教思想和语言的基础。和合本出现之前,基督教的思想 and 语言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因此,翻译和合本时,译者不必过多顾及文化冲击因素。在这样的氛围中,和合本的译员们可以采用更忠实于原文的方式进行翻译。

① 引自和合本。文中所引汉语《圣经》经文未加说明者均引自版本《圣经》。

② 引自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1881-1885)。文中所引英语《圣经》经文未加说明者均引自此版本《圣经》。

其三,当时翻译理论的发展程度。19世纪末期,强调原文的形式对等或语意翻译仍是圣经翻译的主流策略。

其四,和合本译员们是英美人士,操源语者,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们以自我为世界中心的“自我映象”倾向主要体现为在翻译时注重原文,强调忠实。

和合本的译者们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翻译时忠实为重中之重,这与后来 Newmark 对 Buhler(2001:39)的语言功能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不谋而合。这种理论将文本分为三大类:表达功能文本(the expressive)、信息功能文本(the informative)和呼唤功能文本(the vocative),并指出圣经属于典型的表达功能文本,对应的翻译策略是强调忠实的语义翻译法(semantic translation)。

四、和合本的废与存

自和合本出版发行以来,各界基于各种理由,对和合本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和合本译文的艰涩难懂。不过,和合本的难懂不全是译文表达惹的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圣经的内容图式(content schemata)是我们所不了解。内容图式是指有关文化倾向或文章内容的背景知识。内容图式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本内容。圣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距离很大,在某些方面两者甚至背道而驰,比如,中华文化强调“孝悌”,而圣经却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 10:37)。在词汇方面,和合本作为一部翻译作品,必然会包括一些基督教专有名词、专有概念,如洗礼、重生、恩赐、恩典、平安、信(心)、方言、什一、义、中保、完全等等;同时还有一些古希伯来文化负载词,如割礼(circumcision)、逃城(cities of refuge)、约柜(ark)、至圣所(the Holy of holies)、会堂(synagogues)等等。普通读者若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就无法准确地理解这些词汇的内涵,这无疑加大了和合本的阅读难度。而这些词会出现在任何一部汉译圣经中,因此造成的阅读困难并不是和合本的错。

真正由和合本造成的阅读困难只有一条:由倾向于形式对等的“字句切合”的翻译策略所导致的译文与汉语语言习惯的差别。正如上文中我们分析的那样,和合本力求“字句”与西文切合为妥,因而在字词、词性、语态、句子长度等方面多倾向于源语,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目的语读者阅读的困难。

综上所述,和合本圣经难懂主要是因为圣经难懂,绝非放弃和合本重译一部圣经所能解决。但这并不是说汉语圣经没有再译的必要,恰恰相反,汉语圣经的再译是历史的必然,原因如下:

第一,汉语语言文体的变化。和合本毕竟是百年前的白话文译作,一百年来汉语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合本的译文今日看来已有太多的古旧之味。不但和合本整体给人以“半文不白”的感觉,而且其中一些用词已经被淘汰了。如好合(出埃及纪 21:10,现用“婚姻”)、畜类人(诗篇 92:6,现用“野蛮人”)、兄台(使徒行传 21:20,现用“兄长”)、通事(创世纪 42:23,现用“翻译”)、强解(彼得后书 3:160,现用“曲解”)。一些词的词意变化很大,很容易引起误解,如“消化”(意为沮丧、丧气)、“发明”(意为见到光明)、“手段”(褒义词,意为能力、办法)(刘翼凌,1965:99)。

第二,圣经考古新发现。和合本是依 1881-1885 年的英文修订本为底本,所用资料都早于 19 世纪 70 年代。但其后有几次重大圣经考古发现,如 1895 年在埃及发现的新约片断及 1947 年在死海附近洞穴里发现的死海古卷。尤其是后者的发现,出土了一些更早更可靠的手抄本。这使圣经学者得以校正一些通行本中的传抄错误。这种因考古发现而修正的通行本中的错误数量虽然很少,但意义重大。

第三,圣经文本批评学和语言学的发展。圣经文本批评学的发展能更科学地比较、研究手抄片断以决定最佳措辞的文本。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语言研究也有长足进展,目前专家们对

古阿卡得语(Akkadian),乌加里特语(Ugaritic)等古代中东语言了解更多,这对理解翻译一些原来相当模糊不清的词汇大有帮助。

第四,不同的翻译策略。在圣经翻译史上,有极度注重形式和词句一致的形式对等翻译(formal equivalence),如《七十子译本》等,有相对自由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如《钦定本》、《和合本》等,有注重读者阅读效果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如《现代英语译本》、《现代中文译本》等,以及只注重内容信息传递交流的解释性翻译(paraphrase),如 Good News For Modern Man,等等。随着翻译策略的变化,新的译本也会不断出现。

综上所述,再译是必然的,《和合本》一本独尊的局面迟早会被打破。其实,这一进程已经开始。1979年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在慕道友和初信者中比和合本更受欢迎。但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和合本》会被其他新译本替代,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和合本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原因如下:

第一,翻译忠实。总体来说,和合本翻译严谨信实,对于查考经文研究圣经的人员来说,它更“信实”地保存了神之道。

第二,和合本的语言具有历史感和虔敬性,符合圣经作为一部历史和宗教典籍的特点。

第三,使用习惯。和合本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是基督徒信仰生活和圣经学术研究的统一译本,奠定了中国基督教的语言。广大基督徒和学者,都已习惯了和合本的词汇和表达。如果改用其他译本,势必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语言上的混乱和交流上的困难。

第四,教会的决定。和合本出版之后,各欧美在华差会决定在各自的教会中统一使用和合本,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沿用了这一译本。目前在教会的敬拜活动中,仍统一采用和合本,尚无丝毫迹象表明教会要摒弃和

合本而采用其他译本。

综上所述,今后会出现更多的为了不同目的,针对不同读者的不同圣经汉译本,它们会与已出版的其他圣经汉译本一起逐步得到更多的认可,引起圣经读者的注意,甚至走进一些教会。但和合本将因其特点而长期存在,就同英语钦定本一样。

参考文献

- Halley, H. 1924. *Bible Handbook*.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 Marlowe, M. Was the Bible Written in 'Street Language'.
<http://www.bible-researcher.com/language-koine.html> (April-5-2004).
- Newmark, P. 2001.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Nida, E.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 Strandenaes, T. 1987.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nd Col. 1*.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 诚质怡, 1965, 圣经之中文译本, 贾保罗, 《圣经汉译论文集》, 香港: 基督教辅桥出版社。
- 顾教铎, 1965, 圣经国语本译文检讨, 贾保罗, 《圣经汉译论文集》, 香港: 基督教辅桥出版社。
- 贾保罗, 1965, 中文圣经之修订——前途如何, 贾保罗, 《圣经汉译论文集》, 香港: 基督教辅桥出版社。
- 刘翼凌, 1965, 改译中文圣经的一个建议, 贾保罗, 《圣经汉译论文集》, 香港: 基督教辅桥出版社。
- 文庸, 1992, 《圣经蠹测》,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 吴义雄, 2000,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 香港海天书楼(编), 1996, 《中文圣经启导本》,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 许牧世, 1983, 《经与译经》, 香港: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 赵维本, 1993, 《译经溯源》, 香港: 中国神学研究院。

(通讯地址: 710062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陕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